

赫德爵士传

——大清海关洋总管

王宏斌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走近赫德

(代前言)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者知道，赫德是近代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一生追求他的爵士梦，而历史给了他机遇，中国成为他实现梦想的政治舞台。从1863年到1908年，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为中国海关及清政府财政作出重大贡献，可以说是他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使之成为当时清政府少有的清廉高效的机构。他不仅管理着整个海关，而且作为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还创办了中国邮政，参与筹建中国海军，参与创办同文馆计划，直接插手1884年中法、1886年中葡外交谈判，成为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恭亲王亲切称之为“我们的赫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赫德在清政府中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与晚清政治是分不开的。

1893年英国政府授予他从男爵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国的工作；1902年，清政府加封他太子少保衔，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1911年，赫德病卒于英国，清政府派人参加了葬礼，追封为太子太保尚书衔，对于一位外国人来说其谥号荣宠已无以复加。

关于赫德的评价，中外历史学界分歧极大。伦敦《泰晤士报》认为，在中国海关工作时的赫德是所有英国人的天才和劳绩所能制造出来的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清政府对于赫德的使用经历了由半信半疑到依为靠山的过程，由官方修订的、代表清政府观点的《清史稿》的盖棺定论是：“赫德久总税务，

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是一个“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大清忠臣。

而另一方面对赫德的评价则是彻底否定，认为他是一个“貌类忠诚，心怀鬼蜮”的恶魔，薛福威在《庸庵文编》中认为他“阴鸷而专利，沽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赫德在中国的活动也持完全否定态度。这方面重要代表是汪敬虞先生，认为赫德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名重要代理人，是一个狡猾的殖民者。

本书不囿成见，从《中国海关密档》、《英国外交档案》、《赫德日记》等中外史料中选取大量珍贵史实，力求各种偏见，从不同侧面仔细观察赫德其人，全面把握其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个性特征。

应该说，赫德是一个具有理性、有一定原则的人：一方面，作为英国人，他为英国利益服务；同时赫德也以清政府“客卿”自居，在中国利益与英国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站在中国立场上，在列强面前为中国据理力争，做了许多有利于清朝统治的事务。因此，《清史稿》中关于他的评价不能看成虚语。

本书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至出了这位“洋大人”丰富的一生。在仕途上，他是一个智慧、坚忍、充满侵略野心的人，他周旋于中英及列强的政治夹缝之间，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如果抛弃偏见，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客。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有情爱、有父爱、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总之，赫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需要哥我们从各个角度去了解他，走进他。

目 录

1	爵士梦想.....	1
2	领事馆的翻译.....	13
3	初露外交才华.....	26
4	进入中国海关.....	32
5	“ 我们的赫德 ”	40
6	阿思本舰队风波.....	54
7	李鸿章与戈登的撮合者.....	66
8	中国海关的独裁者.....	76
9	而立之年的旁观论.....	89
10	第一次返回欧洲.....	97
11	赫德与蒲安臣使团.....	107
12	海关制度的建立.....	114
13	军火生意与佣金.....	126
14	赫德的家人.....	138
15	《烟台条约》与夹板气.....	144
16	不惑之年的中国建议.....	150
17	“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	161
18	第二次返回欧洲.....	170

19	“ 勇敢地坚持下去 ”	184
20	总海防司计划的落空	197
21	“ 厨子太多煮坏了汤 ”	216
22	辞去驻华大使职务	237
23	鸦片税厘并征谈判	252
24	“ 取得实利，让出虚名 ”	269
25	在闷火中烧烤	277
26	“ 宁被诅咒，不被埋没 ”	284
27	固执的父亲与执拗的儿子	292
28	冷眼看中日甲午战争	300
29	大贷款与“ 保位战 ”	325
30	“ 改革不会被扼杀 ”	335
31	“ 捕鼠夹中的老鼠 ”	347
32	《 这些从秦国来 》	365
33	家事的烦恼	381
34	“ 时间将塑造完美的结局 ”	387
35	“ 慎重从事，逐渐发展 ”	398
36	海关内外的勾心斗角	412
37	是舍不得还是离不开	425
38	尾声	440
	征引书目举要	448

1

爵士梦想

“我相信我的家族起源于亚当。我不知道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前，我们家族是否在英格兰，但我相信，我们是在威廉大帝三世时初次出现在爱尔兰的；在母亲方面，我们有英国的埃德家族和苏格兰的布鲁斯族。我不知道我们家族里是否曾有人使我们特别显贵。”（《中国海关密档》第5册，第750页，1893年8月13日赫德致金登干信。）这是赫德于1893年8月13日在接受英国勋章院的调查时写给他的亲信金登干的信中所说的。话语中既隐约表达了对平民家世的某种遗憾，又明显流露出对显贵的强烈追求。

《清史稿》说：“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清史稿》卷435，第12362页。）这句话表达并不准确。英文Robert Hart的中文对译是鹭宾·赫德，鹭宾为名，赫德是姓。在中国，赫德以姓名于世，按照习惯，他的名被人误以为字，则情有可原。另一种说法更使人啼笑皆非。民国时期竖立在上海外滩的赫德铜像中文铭刻是：“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上海研究资料》第371页。）在这里，“赫德”被一分为二，“赫”成了姓，

“德”为名，真是大错特错。

现在，我们回到《清史稿》的记载上来，按照习惯说法，仍以其姓代其人。“倍尔发司”是英国北爱尔兰的Belfast的译名，通常译为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与赫德及其家族的确有密切关系，但它并不是赫德的出生地。

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马郡（County Armagh）的一个叫做波塔唐的村镇里。这个镇子里住着一个酒店老板，他的名字叫詹姆士·赫德（James Hart）。赫德家经营的酒店规模不大，在这个只有两千多人口的村镇里并不十分显眼。詹姆士·赫德的长孙鹭宾·赫德出生时，他们的家境仍不富裕，为了生计曾几度搬迁。在小鹭宾刚满周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迁移到波塔唐北面的米尔顿。亨利·赫德（Henry Hart）作为詹姆士的长子和小鹭宾的父亲准备承担起全家的重担，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酒厂，全家都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希望，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由于不小心，一场大火把酒厂化为灰烬。赫德一家被迫无奈再次迁移到希尔斯堡（Hillsborough）。

小鹭宾的母亲安·埃德加（Ann Edgar）是阿尔马郡一个农民的女儿。埃德加家族原来是苏格兰人，14世纪住在北爱尔兰。安从幼年起一直与其哥哥住在波塔唐，因此得以与亨利·赫德相识、相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家庭的后代，他们之间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

赫德家族虽然很普通，但他们世代相传着一个关于祖先的光荣故事：据说赫德的祖先是一个名叫凡恩·赫德的爱尔兰人，他是一名英勇的船长。1690年，凡恩·赫德随从威廉三世，在渡海征服爱尔兰的波义姆战役中立下奇功，得到威廉王的加爵封赏，并把爱尔兰的基尔莫里亚蒂（Kilmonarty）封作凡恩的领地，赫德家族从此开始定居在爱尔兰。后来，凡恩挥霍无度，不善理家，结果负债累累，潦倒一生。他的子孙为了还债不得不把他的封地出卖出去，所

以，赫德家族的显赫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败落了。这本来只是一种传说，它的唯一旁证，是赫德的祖父詹姆士是从基尔莫里亚蒂的一处小农庄搬到波塔唐来的。后来赫德出了名，有人在欧洲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专门对赫德的远祖进行了考证，结果发现在波义姆战役的名将录中，并没有姓赫德或与此类似的人名，而基尔莫里亚蒂虽然几易其主，其中也有姓赫德的主人，却又不是从荷兰来的；而且，在北爱尔兰，尤其在阿尔马郡北部，“赫德”是一个极普通的姓，往往同一地区可以找出许多并无血统关系的赫德家族来，单是同姓似乎不足为凭。

鹭宾·赫德在中国成为显贵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对这段家史极感兴趣。他花费了很多功夫，排出了一张世系表，从他的父亲开始只能上溯五代，除了显示其祖先来自基尔莫里亚蒂之外，其它什么也不能证明。关于这段家史连赫德本人也承认“什么也不能证明”。他在1893年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我确实不知道我属于哪一个赫德家族！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或者是后者的父亲，是威廉国王军队里的上尉，传说由于某种特殊功绩被授予一块称为基尔莫里亚蒂的土地（在阿尔马郡，波塔唐附近的小镇）或是在接受了赏赐后，在那镇上定居下来。阿尔马郡的基尔莫里亚蒂·赫德和多尼格尔县的基尔德里·赫德是否同一家系，我无法肯定。就我所知，家族纹饰据说像‘一捆小麦’，这使我想起它同基尔德里·赫德家的家族纹饰，即‘从一个有三座塔楼的城堡中发出一颗燃烧着的红心’，可能是相同的。人们很容易懂得，一个没有谁向他解释的人，会将这城堡认为、或描述为‘一捆’。基尔德里的纹章上有三朵‘百合花’；据家庭传说，我们有一位皮尔斯·赫德上尉的亲戚，1664年埋葬在都柏林的圣约翰教堂，他的纹章上也有三朵‘百合花’。但是这些事情我什么也不能证明。在另一方面，据说我们在威廉国王的军队里的那位祖先，是同荷兰的奥朗日王子一起来的，他的姓是哈特，前面或许有一个‘范’字。对此，我也不能证明。”

(《中国海关密档》第5册，第698页，1893年5月25日赫德致金登干信。)

这里无需去考证赫德家史的真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段家史对赫德人生观的深刻影响。尽管凡恩船长的故事几乎是无稽之谈，而赫德家族却对此深信不疑，代代相传。赫德在6岁的时候，他的姑妈玛格丽特就把这传说一遍又一遍地讲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听。也许是出自人类对英雄崇拜的本能，也许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动人，总之，在小鹭宾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有一天，他居然一本正经地说：“我长大后，要重新买回基尔莫里亚蒂，我还要获得一个爵位！”(Juliet Bredon: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P.11, 1909年。)

这个故事不仅深刻地印在小鹭宾的脑海中，而且对赫德的一生都产生着巨大影响，爵士梦想成为其人生奋斗的动力。赫德深信自己的血液中继承了贵族的品德，“而这种品德就是经过若干代高雅生活养成的彬彬有礼，使朦胧意识的人具有‘他家族的第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风度和头脑冷静”。龙生龙，凤生凤。赫德相信“毕竟社会地位创造奇迹”，出生于高贵的家庭的人继承其优雅的品质，而出身卑贱的人即使福星高照，也终究是道德观念低下者。类似的故事在许多人的童年也许都曾有过，但只有在某人成名之后，它才成为人们议论的佳话。

“在小学、中学我的目标是全班第一，在大学目标也是第一。”(《赫德日记》1863年12月24日，载史密斯、费正清等编著：《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P. 53.) 这的确是赫德学生时代追求的目标。在赫德入学的时候，他被一位善于相面的老师看中，成为安诺得学校的学生。赫德在这里接受的是普普通通的小学教育。10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小学生活，考入卫斯利安(Wesleyan)学校。这所学校是高中教育的预科，传授的知识近似于初级中学，在此学习一二年后即可

进入高中。卫斯利安学校位于索默塞特（Somerset）郡的陶顿镇上，从赫德的家乡到学校要越过爱尔兰海。赫德第一次在父亲的带领下跨越大海，熙熙攘攘的码头、浩瀚的大海、大大小小的帆船，特别是乘风破浪的轮船都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过多年他还能从查获的走私船中辨别出当年渡海乘坐的“夏洛克号”（Shamrock）海船。

赫德在卫斯利安学校学习了一年拉丁文，结识了许多朋友。第二年夏天，赫德以一种长大成人的神气，井井有条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独自回家度假。在贝尔法斯特，亨利接到他时很不高兴，他认为陶顿学校竟让一个11岁的少年单独进行越海的长途旅行很不妥当。他于是决定把赫德改送到都柏林的卫斯利安联合学校（Wesleyan Connexional School）。这所学校和陶顿的一样，都是基督教卫斯利宗派办的教会学校，神学是必修的课程。独自成功跨越爱尔兰海的经历使赫德增强了自信心，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在以后得到进一步培养。

卫斯利安联合学校以纪律严格而闻名，校长克罗克对校规掌管很严。赫德是一个爱学习、爱动脑筋的学生，但毕竟是一个十二三的顽童，有时候他也故意弄出一些恶作剧来。有一次，一位老师发现了他的毛病，并当面进行了批评，他竟敢在众人面前顶嘴说：“你也不是完人，有什么了不起！你只不过是拿了我们学费的仆人！”这件事轰动了校园，他不得不公开表示道歉，但这使他一举成了校园“名人”。

基督教神学是学校的重要课程，谁如果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他就会被认为是全校最好的学生。赫德暗暗下定决心要夺取桂冠，但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在刻苦攻读；当他人紧张复习时，他却能抽出时间到操场上运动一阵，过得轻轻松松。考试之前，谁也没有料到赫德将成为校园明星。由于他平时学习努力，考前生活很有规律，效果极佳，成绩名列榜首，得到学校

一致好评。他充分体验到了第一名受人尊敬的滋味，这种荣誉感又成为自我奋斗的动力。从此他学习更加勤奋。对于赫德来说，在卫斯利安联合学校的收获相当重要，在这里他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养成了谨慎、坚毅的性格，“勇敢地坚持下去”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他为人谦和而有主见，适宜在官场上角逐。所以，他对于这个学校的教育非常感激，几十年后，他曾热泪盈眶地谈及学校的小桥流水、高大的树木、宽阔的马路和教堂。（史密斯、费正清等编著：《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第6页。）

1850年，15岁的赫德，在距入学的最低年龄还差两年的时候，就考入了贝尔法斯特的最高学府——皇后学院。在校三年中，赫德一直居于优秀生的行列，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励。对于皇后学院，一直到他的晚年，还不时表露出他内心的深厚感情。1908年，在结束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漫长生活之后，他在写给同学的一封复信中，还深有感情地这样说道：“当我在中国期间，凡是归功于我个人的每一项成绩，我都把它看作是学院的功劳，看作是对曾经和我在一起学习的青年的酬谢，看作是对指定我到中国去的教授的充分肯定。”（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1909, P. 178.）在赫德去世的当年，他的遗孀在给皇后大学副校长的信中，也透露了与赫德自己所表达的同样的感情。

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成立于1849年，与其它壁垒森严的教派大学相比，它的办学宗旨较为宽松自由，可以容纳不同教派、不同政见以及不同阶层的学生，校内思想相对活跃。赫德的父亲是位新教徒，他不愿意儿子在都柏林升学，就是因为讨厌国教。亨利·赫德为其儿子选择了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相当正确的。

赫德在中学养成的刻苦学习习惯，谨慎、坚毅的性格对于大学生活极为有用。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赫德的独立意志更加坚强。他不喜欢活动剧烈的体育项目，选择了骑马与散步，这与他追求的



学生时代的赫德

贵族生活、爵士梦是一致的。

赫德的学习生活俭朴而刻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家庭经济来源。亨利·赫德有八个子女，维持全家的生活很不容易，不可能拿出很多的钱来供养长子上学。家庭条件决定赫德的大学生活必须靠自己，因此，他必须为奖学金而拼搏，选择第一名的目标也是生活困难逼出来的。他成功了，连续三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

在校学习期间，赫德十分喜欢逻辑学和英国文学。对于英国哲学家米尔的《推理归纳逻辑大系》，赫德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缜密的思维能力由此得到很大提高，难怪他在中国总税务司任上，面对那么纷繁的事物，总是善于抓住主要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赫德对于经济学不感兴趣，而最终又选择它作为政治发展的工具。他在哲学上偏爱法国著名哲学家维克多·库赞的折衷主义，他认为只有折衷主义才是真正的哲学，“它吸收对于一切都好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中国海关密档》第5册，第467页，1891年11月22日赫德致金登干信。）所以，赫德一生总喜欢在各种相互对立的矛盾中寻找找到自己的立场。“由我选择”因此成为他的政治名言。

赫德酷爱文学，喜欢读书，喜欢写诗。在中国，他的晚年可以长期没有家庭生活，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文学读物。当妻子来华与他团聚时，他感到十分高兴，但又为必须陪同夫人参加社交活动失去读书时间而惋惜。对于文学的爱好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赫德对于音乐的爱好更是如痴如醉，青年时期他最喜欢拉小提琴，在中国他每天早晨从8点开始都要拉一小时小提琴，数十年如一日；反反复复地演奏名曲使他达到了自认为不能再提高时，他才改练大提琴。为了使自己的琴艺达到一定高度，他追求“尽善尽美”的乐器，不惜重价购买了一把又一把小提琴和大提琴。直到垂暮之年，他还为组织小乐队乐此不疲。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大学里的主要课程，赫德对此爱好至老不衰。1909年，赫德已是74岁的老翁，他还忆及少年时代阅读古典作品的乐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感叹说：“我真希望拉丁语和希腊语将来不会消失，孩提时代，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迷住了我，今天我却已不能阅读它们了，然而它们深入了我的灵魂，就像树木的成长，是雨露阳光的渗入使之成形和坚固一样。”（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P.167.）

青年赫德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堂，赫德按照中学养成的习惯，定期前往接受精神冶炼。宗教祈祷活动有利于养成信徒对目标的追求和自我反省能力。从下面的一则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生活的养成对于赫德是多么重要。

“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利，还不到29岁，已经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了……，我可以中国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然而这对于我有什么好处？我又气馁又悲伤，这是为什么？回想过去，尽管我成功了，我明显感到我的时间被浪费，精力被滥用，提高自己的机会被错过，我太沉溺于邪恶之中，颠倒了是非，因小而失大。我必须改变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污点，而别人却因此而赞扬我，我明白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明白了我对于目前的位置多么不适应，只有上帝知道。主啊！请你给我指导。”（《赫德日记，1863—1866年》1863年12月24日，载史密斯、费正清等编著：《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第53页。）

对于学校时期的宗教生活赫德十分眷恋，事过30余年，他在给卫理公会教堂的一位主持人的信中这样说道，自从我离开世界的那一部分（皇家学院）以来，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怀着美好的回忆，那里的一切都使我回忆起摇篮的岁月和甜蜜的家。客观地讲，学校既给了他知识的力量，又给了他政治生活行动的指南和精神支柱。

赫德在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含蓄、谨慎的性格。他获得全学院奖学金第一名时，虽然激动得彻夜难眠，却不敢马上告诉家里，生怕好消息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他总是等拿到了金质奖章，才敢发出家信。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紧张的，先天的才能与后天的勤奋的结合使赫德的成绩十分突出。1853年，他在毕业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赢得了近代历史与语言两项奖学金。是时，他开始考虑毕业之后干什么。最初他打算继续攻读哲学或法律硕士学位，而他又不安于将来过着平静、乏味的书斋生活。他的父亲想让他到自己的工厂里做助手，这与他的爵士梦相违背，他没有从命。亨利·赫德经营的酿酒业在1854年已有了初步发展，又成了一家面粉厂的所有者，开始以工场主的名义登记自己的身份，并将全家迁移到了靠近贝尔法斯特的拉瓦涅特（Ravarnet）。赫德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思想坚持说：“由我来选择。”

正在这时，命运女神看中了赫德。1854年春天，正当赫德要选择职业时，英国外交部在爱尔兰皇后学校开始招收到中国和日本工作的领事馆人员。是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官包令（J. Bowring）接替文翰（S. Bonham）的位置，升任香港总督，兼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包令笃信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自由贸易主张，想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他多次上书英国外交部，要求加强英国政府在中国和日本的代表人员设置，把远东各通商口岸真正变成为指导商务与传教的中心。这种意见打动了英国外务大臣克拉瑞顿（Clarendon），英国外交部因此决定在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招收领事馆工作人员。

1852年，赫德曾在贝尔法斯特听过一次关于中国的演讲，东方世界的神秘感差一点使他放弃学业，加入传教士的队伍。两年之后，一个更加幸运的机会来到赫德身边。进入外交机关正是实现爵士梦想的途径，机会与愿望一致，赫德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他立即放弃了继续攻读硕士的打算，向学院负责人递交了赴华申请。与赫德一道提出申请的共有36人，按照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录取。然而，当负责人得知赫德的优异学习成绩后，当即决定免试录用。学校关于赫德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他连续获得了1850年第一届、1851年第二届、1852年第三届文学奖学金和1853年第四届最高奖学金；他在1853年6月、1854年6月各获得一项普通奖学金；他在1852年获得逻辑、拉丁、自然史和法理学四项班级奖学金；他还获得历史学、英国文学、玄学三项班级奖学金以及自然地理学等奖学金。”（《赫德日记，1854—1863年》Robert Hart's Journals, P.10.）事过多年后，赫德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们参加报名的共有36人，按照规定要通过一项考试，但是，校务理事会给我的评价很高，因此，把那项提名给了我。”（同上注）

四年的高等学校生活结束了，赫德就要离开贝尔法斯特登上开往东方的商船。他在皇后学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了缜密的思考方法；接触了各类人物，进一步熔铸了他的坚韧、谨慎、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性格。赫德踌躇满志，大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到中国实现鸿鹄之志之感。

两个月后，赫德来到伦敦，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哈蒙特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概况，特别着重谈了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所在地香港的情况，香港是赫德去中国所要到的第一个地方。1854年他搭乘“堪地安号”轮船准备离开英国南部的索塞普顿。19岁的赫德在辞别送行的熙熙攘攘人群中，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是，10年之后，这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却令人意想不到的出现在中国的政坛上。船上的赫德对于未来满怀期望，告别父母时他只是默默地接受了一遍遍叮嘱，没有多少别愁；船下的双亲较为现实，他们对于长子长途旅行前往那神秘的古国虽不无期盼，而更多的是担心：他回来时会不会成为异教徒？鹭宾毕竟只有19岁，中国的医疗条件又不好，从遥远的东方又不断传来青少年夭折的消息，他能回来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儿子的健康和安全他们考虑的最多，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也只有默默地祝福了。